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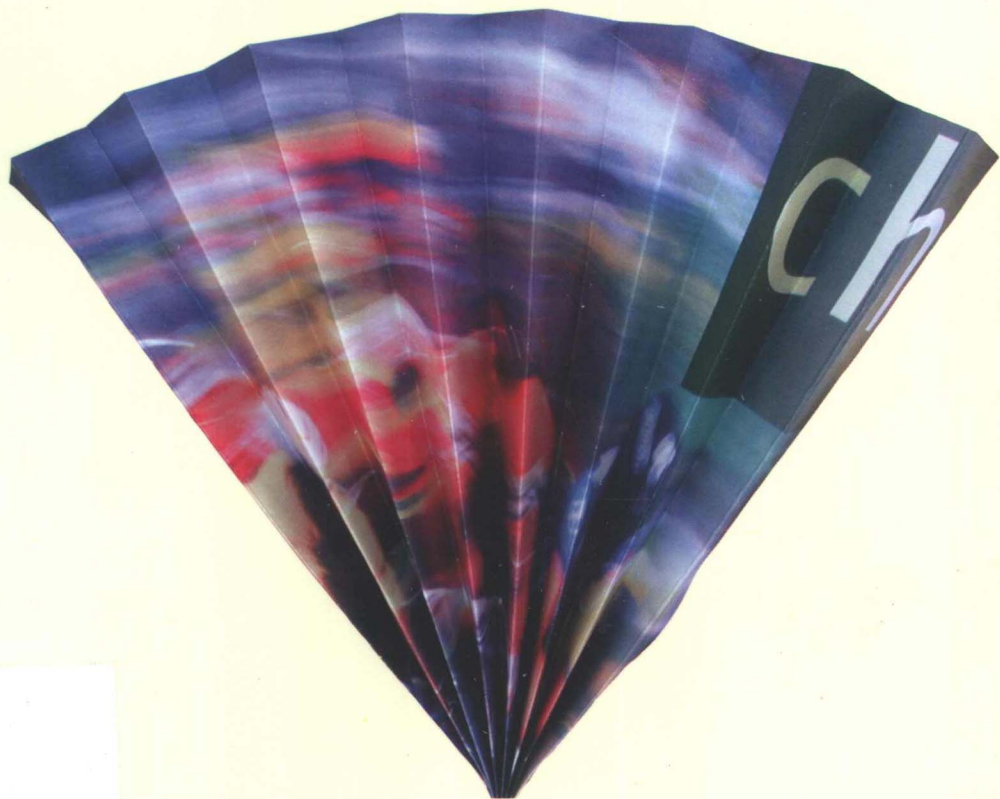
世界中国学家自选集

Self-selected Writings of
World-renown China Scholars

韦政通 著

中国思想传统的 创造转化

韦政通自选集



213

B264

1129A



中国思想传统的 创造转化

韦政通自选集

韦政通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思想传统的改造转化：韦政通自选集/韦政通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9

(世界中国学家自选集)

ISBN 7—222—03528—1

I. 中... II. 韦... III. 哲学思想—转化—研究—
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6972 号

责任编辑 陈盈盈

封面设计 鞠洪深

中国思想传统的创造转化

——韦政通自选集

韦政通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

邮编：650034

云南新华彩印厂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11.75 字数：320 千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222—03528—1/B·129

定价：22.00 元



总序：走向以“意义”为对象的 中国学研究

在讲究“学术规范”的今天，谈论任何学科，似乎首先就会遇到一个“正名”的问题。谈论“中国学”亦然：到底是没有“中国学”？如果有，它的涵义是什么？其实，从“诠释学”的立场上看，这所谓“正名”本来就构成一个问题：由谁来“正名”？谁的“正名”才具有权威与合理性？假如问题追问至此，我们会发现，与其说去问到底有没有一门“中国学”，以及“中国学”的确切含义到底是什么，不如去问：目前谈论中国学或者研究中国学问题的学者，其心目中的“中国学”概念到底是什么。可是问题仍然存在：对于不少“中国学家”来说，他们尽管从事的是“某种”或某种类型的中国学研究，可是他们根本不关心他们本人研究的到底是否属于“中国学”的内容，甚至从根本上否认有那么一门“中国学”。这就说明：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者，其口头上所谈论的“中国学”，未必就与他们实际研究中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学”图象相符。——其实，所谓“中国学”与其说是一个有待于去“正名”的概念，不如说是一种有待于去建构的图象，而且这种图象的建构与研究主体意图与视野相关。

这迫使我们在谈论“中国学”这一说法的时候，抛开所

谓“正名”的问题，而去关注实际中的中国学研究成果。可是问题却未彻底解决：有关中国研究的成果林林总总，到底哪些才属于“中国学研究”的范围？或者说，是否凡有关研究中国的成果，都可以纳入“中国学研究”的视野与范围？对此，我们的回答是：所谓“研究中国”中的“中国”两字，就有不同的理解与涵义——它到底是指一种对象性的“所指”呢，还是一种意义性的“所谓”？假如一旦做出如此的区分，那么，可以认为，我们心目中的所谓“中国学”中的“中国”，其实是着重于“中国”的“所谓”的。这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说，所谓“中国学研究”不是其他，而是一种关于中国的意义性研究。这种意义性的研究在具体研究中虽然离不开它的“所指”，但它关心的是这对象性所指中的“意义”。以对汉代“铜镜”的研究为例：既可以对它作纯“对象性”的研究，考察它的铸造年代、图纹花饰，以及性能和用途等等；但假如不局限于此，还通过对它的生成年代，以及图饰花纹和性能用途等看出更多一层的意义：这意义可以是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也可以是哲学、伦理学或其他方面的等等，那么，它就具有了“中国学”研究的意蕴；而假如这种研究虽然从考释具体的文物着手，其要达到的目的却在于揭示出研究对象或者研究文本的意义，则这种研究当属于“中国学研究”无疑。

一旦从“意义”的角度来谈论关于中国的研究，可以看出，传统的所谓“汉学”与“中国学”之争，即到底关于中国的研究应该称之为“汉学”还是“中国学”，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很好地解决的。所谓“汉学”研究并不意味着就是对于传统中国，或者对于中国传统的语言、文物等等的研究，而所谓“中国学”研究也不就是指对于近现代中国，或者关于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汉学研究”与“中国学研究”的区分与其说是对象或“所指”的区分，不如说是在研究对象上“所指”与“意义”的区分。事实上，由于历史是一个连续体，不同对象也往往相互联系与交叉，仅仅从“所指”方面来给“汉学研究”与“中国学研究”划分范围是很难

的；但同样是关于中国历史、文物乃至现状的研究，其着眼于“所指”还是“意义”的研究，这两者却容易加以区别。

一门关注于“意义”的中国学研究，其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可以打通传统的所谓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划分，以及研究者将研究对象孤立起来导致的研究的自我封闭与研究之间的隔阂，而使关于中国或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成为一个整体，而且这种研究还有助于中国文明和文化与其他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与了解。我们知道，同样是关于意义的研究，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其对于“意义”的理解，或者说其关于“意义”的涵义，是大不一样的。而只有着眼于“意义”的层面，而非“所指”的层面，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才能很好地交往与沟通。这在当今全球走向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

本丛书之所以冠名为“世界中国学家自选集”，其含义有三：其一，展示与体现一种以“意义”为中心的中国学研究。本丛书关于中国的研究，就“所指”方面涉及很广，包括中国的思想、语言、历史乃至某一专门领域的研究，但它们无不以关于中国的“意义”为依归。其二，致力于展示全球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景观。本丛书收入世界范围内中国学家研究中国的学术成果。这里的“世界”具有两种含义：第一，指这些中国学家的研究成果具有世界性的影响，或者说代表与反映出当代世界的中国学研究水平。第二，指这些中国学家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世界性或“域外”的视野。正是通过这种视野，“中国”作为一种开放的文本，其意义才能更好地呈现。其三，加深对域外文化与思想观念的了解。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沟通从来是双向的。世界中国学家对中国“文本”的诠释与解读，构成研究者视角的各种要素不可避免地会进入其研究活动中。本丛书之所以强调这些世界中国学家的学术成果要由他们本人来“自选”，乃为了这些研究成果能更好地体现与展示他们的“前见”。从这种意义上说，“世界中国学家自选集”呈现给我们的，其实是

一个“双向意义”的世界，是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的双互诠释。

最后要说明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所谓“世界中国学家自选集”，是应该包括中国大陆学者的中国学研究成果的，但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版已多，且不完全符合本丛书设计的目的，故从略。而本丛书之所以收录台湾和香港有代表性的关于中国学研究的论著，这不表示台湾与香港属于“域外”，而是因为港台学者的研究，往往会提供一种不同于中国大陆视野的中国景观；而这对于全方位地展示“中国”文本的意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胡伟希

2002年8月序于北京兰旗营

自序

这是我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5本书，第一本《伦理思想的突破》于1988年出版时，大概是因赶上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末班列车，据说销售了几万册。进入90年代，在市场经济的狂潮下，利润取向常道，非实用的人文学科的书籍，在市场上一落千丈，新进的人文学者，要想出版自己的著作，已十分困难。其实，台湾近年来，也面临同样的困境。

从事人文学术思想的工作，自古以来都是很孤寂的，没有历史文化的使命感，没有超越时代的识见，没有学术思想及文化之根的信念，没有理想主义的热情，就不可能把它作为一生奋斗的目标。这种工作，并无利润可言，它最直接的价值，就是在持续不懈的探索过程中，使自己的生命在知识与智慧的浸润中不断成长；也为了延续文化的慧命，为了提升国人的人文素养，为了改善俗世的愚昧而尽一分心力。

对我而言，40多年的辛勤耕耘，最大的鼓励和安慰来自读者。因此，当我获知此书被收入由北京清华大学教授胡伟希主编的《世界中国学家自选集》，出版这套丛书的云南人民出版社向我要求“无偿使用的权利”时，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大陆版因主编的建议，增加了约1/3的篇幅，使此书比较能完整地呈现我的思想。

书名中“创造转化”的观念，在中文世界，最早是由友

人林毓生教授提出，近 20 年来，这个观念在华人的文化圈、学术界相当流行。这一现象，就我的理解，它代表着不但能克服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西化派与传统派的长期对立与纠葛，也超越了可能缺乏自信的“中国学术思想如何现代化”的命题，将一百多年来学者们有关思想变革的看法，导入至少在心态上是相当健全的方向。“创造转化”其思想的精髓，不但对中国的思想传统在态度上应采取批判地继承，对西方文化也应做到批判地吸收，彻底解除以往“我族中心”或“西方中心”文化交流上的不平衡、不理性的状态。

此书的台湾版，完全由欧崇敬博士一手促成，大陆的也是他从中联系，胡伟希教授愿将此书纳入他主编的丛书，陈盈盈女士很有见解地把书中的文章重新编排次序，在此一并向他们致谢。

韦政通

2002 年 8 月 10 日台北市内湖碧湖之滨

目 录

第一辑

- 我对中国思想史的几点认识…………… (3)
中国思想史方法论的检讨…………… (17)
如何研读《论语》…………… (41)
我怎样研究《荀子》
——兼谈整理诸子的方法…………… (61)

第二辑

- 中国人的思想
——兼谈思想更新之道…………… (73)
中国哲学史上四种不同的人格…………… (86)
孔子：创造性转化的典范…………… (102)
仁的哲学的时代意义…………… (136)
孔子成德之学及其前景…………… (156)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动向
——余英时《历史与思想》评介…………… (178)
“创造转化”与“自我实现”
——论晏阳初的思想与人格…………… (189)

第三辑

- 时代危机与中国哲学…………… (209)

从“疏离”问题看中国哲人的智慧·····	(221)
人与自然的关系	
——和谐宇宙观的现代反思·····	(238)

第四辑

人性与伦理·····	(255)
工业文明的伦理新貌·····	(268)
自由、民主与伦理·····	(283)
新伦理的动力·····	(296)
走出道德思考的死胡同·····	(309)
当前道德问题的诊断·····	(319)
儒家伦理在“台湾经验”中的角色·····	(331)

附 录

思想的探险者	
——韦政通教授访问录·····	(351)
著作年表·····	(365)

第一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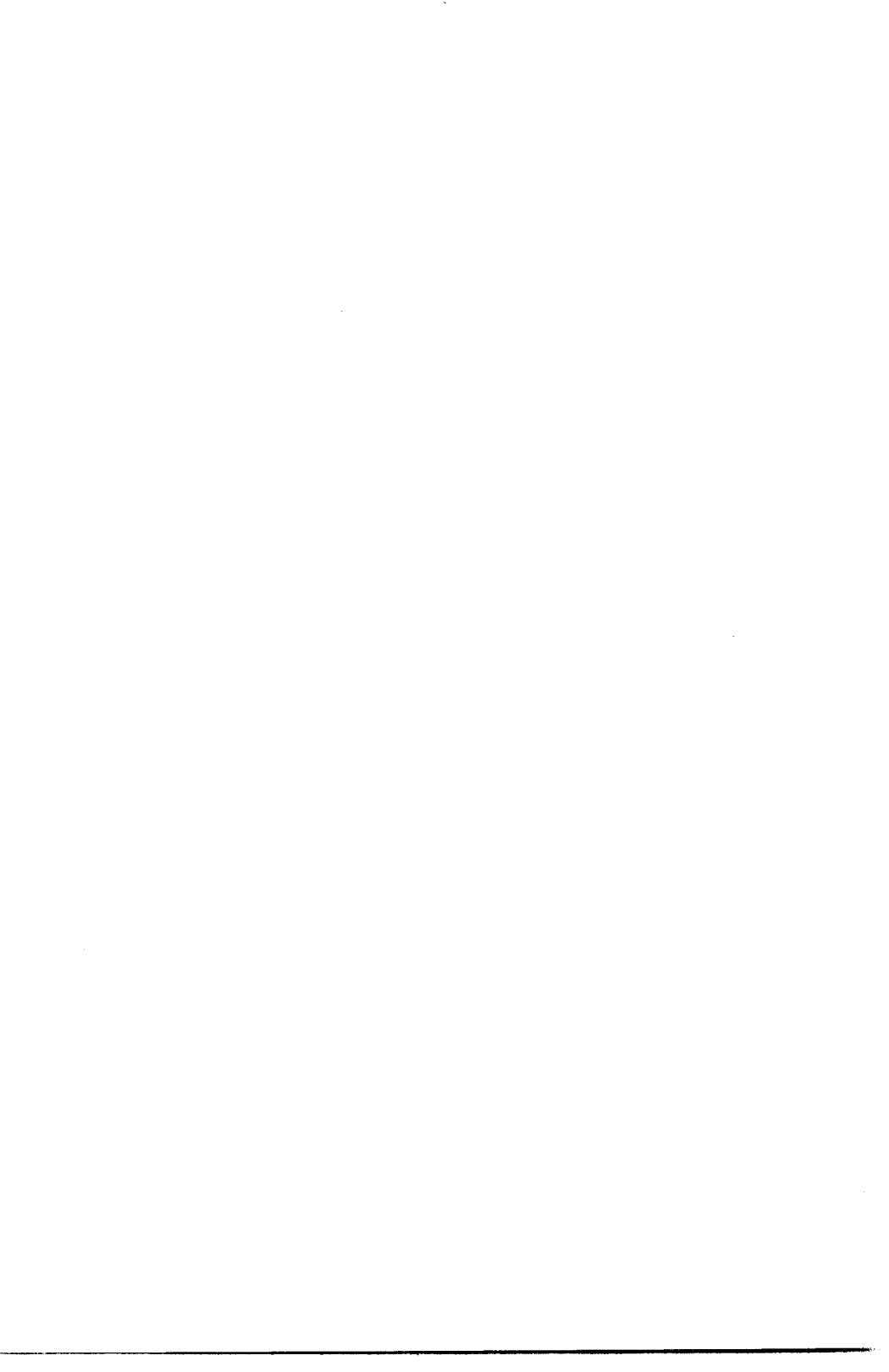
我对中国思想史的几点认识

中国思想史方法论的检讨

如何研读《论语》

我怎样研究《荀子》

——兼谈整理诸子的方法



我对中国思想史的几点认识

编者按：

本文系韦政通先生所著《中国思想史》（大林出版社，1979年11月）的绪论，经征求作者及大林出版社的同意，本刊特予刊出，以饕对中国思想史有兴趣的读者。

《中国思想史》上、下两巨册，都1400余页，为韦先生多年治中国思想史的力作，目的在于有系统地探讨中国过去2000多年中，思想家们对人类最基本的问题如何思考，提出怎样的看法。韦先生用自己的思想，把史料中所蕴涵的哲理，一一揭示出来，一点也没有史料堆砌的缺点；之所以能如此，实由于韦先生有其自己的一套思想史的看法，这些看法就包含在这篇文章之中。

一 为什么要研读思想史？

一部好的思想史，对所有具备相当知识的人，都可以是开卷有益；因为思想史不限于某一家或少数几家的思想，其中包括二三千年来最重要和次要的思想家的心灵或观念的活动。思想史也不比专家哲学的研究，后者可只讨论理论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仅为少数哲学专业者所关心；思想史除了理论之外，还要了解哲学家这个人，将涉及他的具体生活、际遇、意识活动，以及他如何面对种种的困境，甚至连他们的

悲伤和喜悦，我们也能亲切地感受到。思想家一旦进入思想史中，就都成为一个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他们有各自独特的性格、习惯及偏好，你可任意挑选一个，随时和他展开对话。更重要的是，每一个思想家，都有他独特的奋斗经验、人生意义，以及他走过的人生道路；你也许不喜欢他们的理想，也可以不赞同他们的主张，但是，他们追求的热情和丰富的经验，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多少可给予一点激励和启发。

当然，一本思想史这样的书，它主要的对象，是那些知识性的专业工作者。这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专攻哲学的，对一个立志要探究哲学的人来说，研读思想史属于基础训练的一部分，从它那里不仅可以吸取必要的营养，以扩展自己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在不同性格和理路的亲近与跟随中，可以测知自己可能发展的趋向。思想史就像一所活动而开放的哲学教室，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自由来往，或质疑，或问难，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相待，且具有无限的宽容；他们在助你心智的成长，却永不会索取任何酬报。另一类是哲学之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学者们，在近代知识分化以后，不同的学科已有了各自独立的知识领域，思想史所能提供的，主要是各个学科思想的原型或母体；一旦涉及传统的理论或解释的时候，这些思想的原型或母体，可以提供重要的观点和解答问题的线索。社会科学在我们的社会已日渐受到重视，学者们所受的基础训练，多半来自另外的文化，一个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在接受了必要的理论和方法的训练之后，他必须能站在本国文化社会的立场，并掌握母体文化传统的文献知识，从我们自己的问题和观点出发，去重验那些理论的假设和效果，才可能有机会建立新说。当学者们有此自觉，并准备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时候，思想史无异是一本知识的导游手册。

有人说：“历史乃生命之师。”在许多不同的历史写作中，大概思想史是最靠近这个理想的。历史并不能完全决定我们的未来，但由于历史的教训，的确可以使我们走向茫然

的未来时，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错误和浪费。研究思想史的心情，应该和游览博物馆不同，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古董，可使你神游上古，对古人巧夺天工的技艺赞叹不已，但限于实物，却不容易激起我们的共感和共鸣，思想的表达就不同，历史上许多思想家所处理过的问题和遭遇过的难题，依然是我们正面临的问题和难题。历史的特殊事件不会重演，但人类却一直被一些基本的问题和共同的难题困扰着、挑战着。在这个意义上，所以一位哲人说：古代的预言家和哲学家，在我们的心灵世界里，与现代最有领悟力的作家一样，都是同时代的人。他甚至认为，有些古代作家，比现代畅销书更能搔到我们的经验与情境的痒处。^①要使历史产生这样的效果，有赖于历史作家能重新发现并复活传统的智慧和经验。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的导论中，列举了若干哲学问题，然后说：我们为什么要白费许多时间，来研究这些不能解决的问题？照罗素的意思，所有确定了的知识，就属于科学，不再属于哲学。哲学在我们这时代，所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教人如何不需要确定而生活，而又不致为犹豫所麻痺。^②大多数的人，都需要某些确定的信仰或事实，才能安稳地生活，哲学家却要不断地在不确定中从事探究，以保持对那些永远不能彻底解决的问题思考的热情，这才是真正追求真理的心境，人类学家杜宾姬说：“那些喜欢绝对确定事实的人，是不会喜爱真理的。”与我们的伟大哲人所说的“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的话，是颇能相通的。一个富有哲学才具的青年，在思想史的研读中，学习到一种自行探究的精神，比获得具体的知识要重要得多。

对一个决心以哲学工作为终身职志的青年，我愿意引介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忠告，他曾以三条康德的“命令”为基础，来说明如何能从哲学史的研究中，去把以往的哲学变成我们自己的。这三条命令是：

(1) 为你自己而想。

(2) 在你的思维中，把自己摆在每一个其他人的位置上（去想）。

(3) 与自己目的一致地去想。^③

雅氏认为以上这些“命令”都是永无止境的工作。这也是研读思想史的最高理想。第一条的着重点，是在引发读者主观的兴趣，如不能踏出第一步，就无法展开漫长的心灵之旅。第二条是要培养客观的认知和同情的了解，这是要训练研究和跟随的能力，哲学工作者不具备这种能力，就不能立下既广又深的基础。第三条是要养成判断和评价的能力，这必须经由前面的两个步骤才能培养出来，这一步将决定你是否能成为一个哲学家。第二条是“为学日益”的过程，第三条与“为道日损”的境界有些相似，只是这里所“损”的，是别人的思想，以便把自己的见解在损除的过程中逐渐凸现出来。哲学工作者到达这一步，可以独自奋斗自己的前程了。

二 治中国思想史的方法和难处

治学要有或懂点方法，这话是对的，但过分迷信方法，以为只要有一套方法的训练，就有把握弄好一种学问，这是把治学过程，以及和它相关的因素，过分简化了的一种想法。就治思想史而言，史家所面对的，是许多不同性格、不同时代、不同思想类型和系统的对象，谁能为我们设计一套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呢？任何人都不能。

近年阅读所及，我觉得布罗诺斯基的《西方思想传统》，在思想史的方法上，是一个值得参考的例子。此书一个重要的特色，是着重不同思想领域的交互作用和思想发展的环境，所以写出来的内容面貌，和一般哲学史很不一样。一般西方哲学史的作家，一向都是把哲学思想当做一个孤立的过程来处理；这种方法运用于西方，依然能获得相当好的效果，因西方哲学纯知性的活动成分很高，哲学家们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和中国哲学家是大不相同的。像在儒家传统里，一个思想性的人物，支持他生活的一个最强烈的因素，不是思想本身的探索，而是历史文化的使命和社会风教的责